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5.019

“回归马克思”:批判教育学的发展选择及其问题

——以麦克拉伦的探索为例

周险峰,王熹

(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摘要:以麦克拉伦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批判教育学者,在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加深及左派重振运动的背景下,提出“回归马克思”,其目的在于使批判教育学变成一种废除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克服人的异化而实现人的解放的教育学。批判教育学“回归马克思”实际借用了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解释的概念范畴和分析框架。由于批判教育学理论的非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立足于修补的改良色彩,因而回归马克思的努力也只是“修正”马克思主义,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意义是有限度的,因此它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

关键词:批判教育学;左派重振运动;“回归马克思”;经典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5-0150-09

作为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反思中主张回归马克思(Returning to Marx)。所谓“回归马克思”,指的是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本身。这种回归“立足于对马克思文本的深度耕犁,秉承马克思的基本话语主题,力图实现全面‘回归’马克思的原初叙事”^①。在此背景下,基于民主左派立场的批判教育学对这种动向也作了一定程度的反应。例如,以美国的麦克拉伦(Peter MacLaren)等为代表的批判教育学者不失时机地提出“回归马克思”,提倡“革命的批判教育学”(revolutionary critical pedagogy)或“共产主义批判教育学”(communist critical pedagogy)^②等,表明了批判教育学发展的一种新动向。那么,其回归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可能性如何?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能成为西方批判教育学的必然归宿吗?

一 何以要“回归马克思”

历史地看,早在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西方人道主义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提出“回到马克思”,不过,由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流行,“回归马克思”这一话题逐渐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淡出。20世纪90年代该话题被广泛重提,成为重要的学术研究动向或研究现象。这一现象早已超出了它的原初意义,被泛化为一种集合不同观点的理论用语^③。尽管观点不同,但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和制度安排,拒绝既存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指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笔者注),反对国家政治或自觉与其拉开距离,新的时代如何为共产主义观念辩护作为自己理论关心的主题等

收稿日期:2023-04-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BOA200049)

作者简介:周险峰(1969—),男,湖北浠水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①陈良斌,盛凌振,许苏明:《“回归”马克思的原初叙事——论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解读马克思社会批判的基本话语主题》,《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②何萍:《论“回到马克思”现象》,《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5期。

③何萍:《论“回到马克思”现象》,《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5期。

方面却是一致的^①。从西方社会和理论的背景看,“回归马克思”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和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及左派重振运动有关。

20世纪末,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去共产主义”的狂潮一时间在欧洲的格鲁吉亚、匈牙利、立陶宛、波兰等国掀起。但是,就在“历史终结论”宣告资本主义胜利的时候,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危机再次加深。如何超越现存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人类未来寻找一个可替代性的方案,是当代许多理论家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D. Wolff)所言:“马克思主义最有效地凝聚了对资本主义及其理论的批判性分析和评论……对于寻求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的理论家和活动家来说,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宝贵的资源。”这样,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日益深化,“资本主义危机的受害者和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就不可避免地开始转向求助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了^②。

共产主义在东欧和苏联的衰落对西方左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使左派失去了昔日仿效的样板,在左派中产生了一种失落感与方向迷失感。这一现象在拉美地区也表现得特别明显^③。左翼知识分子也陷入了理论危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是如此之深,以致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如今甚至对这个标签都唯恐避之不及。”^④

因此,回归马克思、复兴共产主义也就成为左翼重振行动的重要动向。1993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科学家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联合会议、1995年在巴黎召开的“95国际马克思大会”、1998年在巴黎召开的“《共产党宣言》国际纪念大会”、1999年在德国图林根召开的“21世纪来临之际的马克思主义”研讨会、2001年在纽约召开的“社会主义大会”、2008年在芝加哥召开的“2008社会主义大会”等国际性的会议都彰显了这一重建意愿。进入21世纪后,世界各国特别是北美左翼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在纽约举行一年一度

的左翼论坛,共同反思、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并憧憬未来社会。左翼组织日益成为国际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⑤。

作为西方左派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批判教育学对此也适时进行了回应。批判教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麦克拉伦在一次访谈中说,在2007—2008年间,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呈现,在北美,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人们广泛讨论这些危机究竟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制度性危机,还是又一波的经济波动。他个人也从1994年起,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坚信在当今时代下,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应当阅读研究马克思。在墨西哥,麦克拉伦和他的马克思主义同僚们每年都组织以“回归马克思”为主题的国际会议^⑥。

“回归马克思”也是批判教育学试图走出困境的一种努力。麦克拉伦及一些学者指出,因为脱离了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源,批判教育学已成为一种被驯化的牺牲品;批判教育学也被简单化为一套“工具”和“方法”,也就是批判教育学的发展只专注提升学生的批判意识并倡导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姑息行为(palliative action),而不是革命的变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库里·马洛特(Curry Malott)以及德里克·福特(Derek Ford)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担负起了为复兴完全真实的、批判性的、具有解放形式的教育学而战的使命,其目的就在于揭露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这里值得一提的代表性著作是《马克思、资本与教育:迈向形成中的批判教育学》(Marx, Capital, and Education: Towards a Critical Pedagogy of Becoming)。在这本书里,库里·马洛特及德里克·福特有力地表明,一个革命的批判教育学是与马克思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批判教育学不能仅仅是培养批判意识的教育学,这种教育学在他们看来只是一种“认识论的努力”(epistemological endeavor),批判教育学应是关于战胜异化并废除剥削阶级关系的教育学,这种教育学是将“自然系统从资产

①王福生:《当代西方激进左派复兴共产主义观念的一个批判性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5期。

②理查德·沃尔夫,史清竹:《资本主义危机与回归马克思》,《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9期。

③豪尔赫·卡斯塔涅达,杜燕凌:《共产主义的衰落和拉美左派》,《国际共运史研究》1993年第1期。

④Wright Erik Olin, Levine Andrew, Sober Elliott. *Reconstructing Marxism: Essays on Explanation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y*. London: Verso, 1992, p. 179.

⑤张新宁,杨卫:《特朗普时代的左翼及其抵抗策略——2017年纽约左翼论坛评述》,《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7期。

⑥彼得·麦克拉伦,于伟:《学者对于正义的追寻——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访谈录》,《外国教育研究》2015年第6期。

阶级的专断控制解放出来的过程的一部分”^①。

进入21世纪后,批判教育研究呼唤重新开启马克思与教育的对话,代表性的著作是圣安东尼·格林(Anthony Green)主编的 *Marxism and Education* 系列丛书(Palgrave Macmillan, 2010)。正如编者在该丛书的介绍中所称,鉴于马克思对批判性社会分析所产生的持续性影响,为了不断鼓励开发马克思在教育中的遗产,应该严肃而不是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以一种开放的精神开启马克思主义与教育之间、马克思主义及其批判者之间的对话。该丛书合计有8本,主题涉及广泛,既有重启马克思主义与教育对话的呼吁,也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照批判教育学的一贯主题,如种族、性别、身份、阶级等问题。麦克拉伦则更为激进,直接用《革命化的教育学》(*Revolutionizing Pedagogy*, 2010)作为书名来表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

总之,在西方左派重振的时代背景下,批判教育学为了更有效地增强其批判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教育的锋芒,“回归马克思”因而成为其努力的一种方向。

二 如何“回归马克思”

那么,批判教育学是如何回归马克思的呢?总体看,它力图摆脱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借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叙事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怀抱,同时密切关注甚至参与社会运动成为批判教育学者的理论与实践选择。所谓回到马克思的原初叙事,也就是借用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与自由、生产劳动、权力、实践、辩证法、阶级分析甚至革命等概念范畴重塑批判教育学。实际上,这种叙事回归是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的一种分析路径。

批判教育学的理论来源驳杂,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一。“回归马克思”具有赓续并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意味,这种赓续复兴有一定的演进逻辑。这里以麦克拉伦的探索为例尝试回答批判教育学是如何回归马克思这一问题的。在西方,有人曾评论说,“感谢麦克拉伦的工作,教育领域又有了马克思的观念”^②,这正说明了麦克拉伦推动批判

教育学回归马克思的影响力。

1985年,受美国著名的批判教育学者吉鲁(Henry A. Giroux)的邀请,麦克拉伦前往美国迈阿密大学(University of Miami)教育学院工作,并担任助理教授。应该说,这是他从事批判教育研究的起步。他与吉鲁一起密切合作了8年之久,见证了批判教育学在北美的成长与发展并成为北美批判教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1993年,他被聘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教育与信息研究生院的教授。此时由于马克思主义转入了地下,他是该校教育信息研究系唯一的马克思主义教师^③。

麦克拉伦是个多产的学者,迄今为止出版了50余部著作,撰写了数百篇论文,其研究跨越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符号学、课程理论和文化批评等领域,曾4次荣获美国教育研究协会的最佳著作奖。在2017年的全美教育年会中,他成为终身成就奖唯一的获得者。

根据麦克拉伦的夫人王雁的研究,麦克拉伦的学术生命史可以以1994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94年前的时期以批判的民族志、批判教育学、课程研究和批判的多元文化主义为主题,侧重点在于批判的解放理论、自我意识理性的发展,试图帮助广大师生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得以再生产的。尽管1994年后的研究主题并无根本性改变,但是,这一时期注重的却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关注的中心从消费行为与生活方式转移到生产的社会关系上^④。1994年,麦克拉伦修改的《校园生活》(*Life in Schools: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Pedagogy in the Foundation of Education*, 1989)第二次出版,标志着他的批判教育研究“回归”马克思主义的传统^⑤。

麦克拉伦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走上批判教育学之路可以说比较偶然。他曾在多伦多的一所小学工作了四年半的时间,这使他有幸接触许多来自社会底层的学生并见证这些学生在种族歧视和资本主义双重背景下的无望处境。这所学校位

^①Michelle Gautreaux, Sandra Delgado. "Returning to Marx: A communist critical pedagogy for the 21st century",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2016(11): 1190-1193.

^②Peter McLare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ter_McLaren.

^③Gregory Martin. "Remaking Critical Pedagogy: Peter McLaren's Contribution to a Collective 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gressive Education*, 2006(3): 65.

^④王雁:《美国批判教育学者麦克拉伦的学术生命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⑤魏风云,于伟:《对麦克拉伦之〈学校生活〉的回顾与解析》,《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4期。

于多伦多的简-芬奇走廊地区(Jane-Finch Corridor area),该区是加拿大向原著居民提供的最大的公共住房规划区。

这段教育经历深深刺激了他,为他打下了朴素的批判现实的情感基础,促使他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本书《来自走廊的呐喊》(*Cries from the Corridor: The new suburban Ghettos*, 1980)。该书被《麦克拉伦克林》(Maclean)杂志和《多伦多太阳报》(Toronto Sun)列入年度好书的名单,成为加拿大的畅销书。麦克拉伦表示,写作此书的目的仅是为了使那些住在北约克简-芬奇走廊公共住房里(政府为低收入者所建的住房)备受压迫的学生受到关注;想使在过度拥挤的、设施陈旧的教室里感到无助的教师得到关注,也希望权力部门能够为城市学校提供更多的资源来缩减班额,根据学生的需求发展一些项目,落实一些文化课程和教育学课程^①,如此而已。

但是,令麦克拉伦意想不到的,这本书带来的社会效果与他的预期完全相反,反而助长了人们对移民的反对情绪。麦克拉伦曾坦言,他永远都不会忘记那种痛。正是这种痛开启了麦克拉伦的理论探索之路^②。

1989年,麦克拉伦将该书进一步修改,并以《校园生活:批判教育学导论》为书名出版。这本书也成为批判教育学的代表作之一。相对而言,这个修订本增加了很多左派理论的分析(尤其受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更加理论化,也更加激进,由此确立了麦克拉伦在批判教育学领域的学术地位。该书是麦克拉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教育的开始。

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间,“后”理论却是当时美国高校“左派”学术圈中一种很时髦的话语。麦克拉伦也未能免俗。麦克拉伦尤其受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关系观点的影响。在福柯看来,“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③。麦克拉伦由此认为,批判教育学最基本的关切就是关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他以此批判近代以来的工具理性教育观,主张教育知识的社会建构性。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中心性及同一性,有助于解构传统的意识形

态,促使人们关注并尊重多元的社会主体,为消除种族偏见、性别歧视等提供思想武器。另外,后现代主义对科技(工具)理性的解构也具有很高的方法论价值。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麦克拉伦曾将自己描述为“批判的后现代主义者”,很显然,后现代主义对其批判教育思想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麦克拉伦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分道扬镳,他摆脱了这些理论的反普遍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的立场转向马克思主义。麦克拉伦何以出现这种转向呢?

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相遇源于二者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弊端的批判,甚至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后现代意蕴”^④。二者在怀疑及批判精神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还是有重大的区别:从革命主体看,前者更依赖工人阶级而后者更加重视知识分子;从社会发展策略看,前者更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而后者更加偏重文化心理革命;从社会动力结构看,前者更重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后者则更关注文化科学技术对主体性的压制;等等。另外,马克思主义从事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后现代主义则不遗余力地进行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语言批判等。这种无所不指的批判脱离实践而流于“游戏”与“调侃”式风格^⑤。这种差别实际上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挑战。

2002年,麦克拉伦与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合作主编了一本书,书名即《马克思主义反对教育理论中的后现代主义》(*Marxism Against Postmodernism in Educational Theory*, with Dave Hill, Mike Cole, and Glenn Rikowski, 1999)。可以说,该书的标题集中反映了他及同行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意图。该书的十二位作者都是英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工作者。他们认为,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资本统治日益加深、不平等日益突出,在面临这些问题时,后现代主义成了开放的、激进思想形成的一种障碍,如果不借助宏大理论(grand theory),教育研究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形势下新的不平等问题,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提供了

①魏风云,于伟:《对麦克拉伦之〈学校生活〉的回顾与解析》,《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4期。

②王雁:《美国批判教育学者麦克拉伦的学术生命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③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9—30页。

④华丽:《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关系的再思考》,《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1期。

⑤邓伟龙:《试析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精神》,《创新》2008年第2期。

这种可能^①。

麦克拉伦深受切·格瓦拉(Che Guevara, 1928—1967)的革命政治学以及北美批判教育学精神领袖弗莱雷著作的影响,尤其是弗莱雷的《被压迫的教育学》对他影响很深。进入21世纪,麦克拉伦在他的新书《切·格瓦拉、保罗·弗莱雷及革命的教育学》(Che Guevara, Paulo Freire, and the Pedagogy of Revolution, 2000)中,强调了切·格瓦拉反资本主义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Third World Internationalism)以及弗莱雷在扫盲教学方面所做的激进工作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批判全球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作为理论武器是不够的,只有回归马克思,倡导革命的批判教育学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找到一种资本主义的社会替代。麦克拉伦的结论是,教育学应呼吁教师们从事革命性的阶级斗争。他认为:“我们有必要赢得一个立场的战争(war of position),自然,这意味着左派需要创造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物,替代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这个替代物就是社会主义——绝大多数人能在理智和感情方面都投入那种建立并强化其主人翁的力量(protagonist agency)并愿意改变的那些事情上。”^②

为此,借用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麦克拉伦广泛探讨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诸如资本主义与民主的不相容性;对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冯·海克(Von Hayek)的批判;对“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即“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即“IMF”)、“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即“NAFTA”)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的强烈谴责等。在他看来,这些东西虽然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最终加剧了阶级的两极分化和不平等。麦克拉伦还对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

(the Zapatista movement)^③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且发现它与切·格瓦拉的革命政治有一些相似之处。

当社会主义还是禁忌字眼(a dirty word)时,麦克拉伦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注入了新的生命气息,这也是乔·金切诺(Joe Kincheloe)称他为“教育左派的桂冠诗人”(“the poet-laureate of the educational left”)的原因。

麦克拉伦重新回到马克思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并支持他的同事们从事相关研究工作,这些工作为新一代教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开辟了道路。近年来,他的相关作品更是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如:《当代青年的抵制文化与阶级斗争》(Contemporary youth resistance culture and the class struggle, 2014)、《可能性的教育学:行进在“深度民主”路上的社会主义》(Pedagogy of possibility: Socialism on the way to “deep democracy”, 2015)、《马克思与实践哲学》(Marx and the Philosophy of Praxis, 2018)等^④。正是因为如此,有人毫不夸张地说,麦克拉伦的著作标志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复兴^⑤。

那么,麦克拉伦回归马克思主义的什么呢?西方学者对麦克拉伦的《作为一种仪式表演的学校教育:迈向教育符号和手势的政治经济学》(Schooling as a ritual performance: 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educational symbols and gestures, 1999)、《切·格瓦拉、保罗·弗莱雷和革命教育学》(2000)、《学校生活——批判教育学导论》(2006)这三本最关键性的著作进行分析后,以“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教授及批判学者”来界定麦克拉伦^⑥,应该说,这种界定是相当准确的。麦克拉伦深受拉娅·杜纳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 1910—1987)、格奥尔格·卢卡奇、卡雷尔·科西克(karel kosik)、法兰克福学派和保罗·弗莱雷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影响。而在马克思

① Dave Hill, Peter McLaren, Mike Cole, et al. *Marxism against postmodernism in educational theory*, Lexington Books, 2002, p.22.

② *Revolutionary Critical Pedagogy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Capital Today: An Interview with Peter McLaren*. <http://www.hamptoninstitution.org/peter-mclaren-interview.html>.

③ 萨帕塔运动:1994年1月1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墨西哥恰帕斯州发动武装起义,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存在和发展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墨西哥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及恰帕斯经济、政治和社会等一系列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2005年,萨帕塔人发布了《第六次丛林宣言》,明确提出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作为一个反资本主义体制的新型印第安农民运动,萨帕塔运动对当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抗议和挑战以及对新体系的探索,对世界左翼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具体参见王衬平:《拉美左翼运动的新探索——墨西哥萨帕塔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3期。

④ 感谢麦克拉伦的夫人王雁女士提供的麦克拉伦最近几年的论著一览表。本文只列举少数论著题目。

⑤ Ramin Farahmandpur. *Peter McLaren's Critical Pedagogy*. <https://solidarity-us.org/atc/107/p516/>.

⑥ James D. Kirylo. *A Critical Pedagogy of Resistance: 34 Pedagogues We Need to Know*. 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 2013, p.100.

主义人文主义化演进逻辑中,格奥尔格·卢卡奇是始作俑者。此后相继有马尔库塞、弗洛姆、列菲伏尔、南斯拉夫实践派的重要代表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等助推者。而拉娅·杜纳耶夫斯卡娅则是北美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麦克拉伦受她的影响最深。

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马克思早期的著作,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它的发表直接激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本主义解释思路。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强调,人的本质的全面实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人的解放、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为了达到这种解放人的目的,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甚至阶级斗争理论,深入分析并解决资本主义对人的剥削压迫、劳动异化造成人的生存生活异化等问题。因此,在麦克拉伦等人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范畴如解放、自由、剥削、资本、劳动、生产甚至革命等不断出现。也就是说,麦克拉伦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作为一种分析手段,以此思考当前新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大众遭受的剥削与公共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走向解决资本主义压迫遗留问题的进程中必然涉及选择并使用先进的理论工具,特别是那些在压迫制度本身内外运行的理论工具。而在麦克拉伦等人看来,这种理论工具就是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①。

三 能否“回归马克思”

虽然麦克拉伦一系列著作的出版被誉为标志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复兴,但是,对批判教育学能否回归马克思,人们还是提出了很多的疑问。以他的标志性著作《切·格瓦拉、保罗·弗莱雷及革命的教育学》为例,这本书在麦克拉伦重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被誉为“标志着麦克拉伦自身激进工程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自从鲍尔斯和金蒂斯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Life*, 1976)出版以来,在教育领域(教育领域被认为是个保守的领域)还没有出版过一部像这样有可能重新激发讨论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全球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著作”。在评论者看来,

“当今美国公立学校深受危机(例如私有化、军事化、公司化)的折磨,麦克拉伦的著作不仅在对此种危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面迈出了大胆的一步,而且他还超越了鲍尔斯和金蒂斯的激进功能主义方法(radical-functionalist approach)”^②。金奇诺在该书的《前言》中甚至称,21世纪的来临与这本书的出版,也许宣称麦克拉伦为教育左派的桂冠诗人正当其时。在金奇诺看来,没有哪个从事批判教育学的人具有麦克拉伦这种开启一个新理论阶段的能力,从而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教育学与不平等的关系上去。他称,该书集中体现了麦克拉伦所有的研究品质,是他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③。

那么这本书是否真如以上评论者所言,能带领批判教育学者们“回归马克思”、复兴马克思主义呢?

麦克拉伦的这本书追溯了20世纪两个最重要的左派人物切·格瓦拉和保罗·弗莱雷的生平和工作。他尝试将二者的生活和生平与当今学校教育中批判的或革命的教育学实践联系起来,也就是找出这两个历史人物的教育学所使用的方法,并使之成为一种质疑和变革当前全球性的剥削和压迫关系所必不可少的、能为批判主体所用的思想源泉。麦克拉伦认为,这两个重要的教育家和革命者的思想与事迹能够帮助教育者将学校改造成追求社会正义及进行革命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场所。值得注意的是,他特别将目标锁定在教师教育机构中的人员。我们可以理解他的这种意图,因为批判教育学非常重视教师作为“转换性知识分子”(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的作用,寄希望通过批判意识的觉醒来为变革社会做思想准备,而教师教育机构更是在培养教师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与当前许多批判教育学者的论著一样,该书也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新自由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在麦克拉伦看来,新自由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了一个批判性的生态危机(critical ecological crisis),并使社会出现大面积贫困(widespread poverty)。一些自由主义者、进步主义者以及假冒弗莱雷的人士错误地将弗莱雷的工作和批判教育学的观念引进课堂中的对话和合作学习

① James D. Kirylo. *A Critical Pedagogy of Resistance: 34 Pedagogues We Need to Know*. 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 2013, p.104.

② Ramin Farahmandpur. *Peter McLaren's Critical Pedagogy*. <https://solidarity-us.org/atc/107/p516/>.

③ Joe L. Kincheloe. *Che Guevara, Paulo Freire, and the Pedagogy of Revolution. Foreword*.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0, p.1.

上,而忽略了更大的政治工程,即打破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相关的社会经济的不公平。他在书中批判了许多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当然,有些也免遭了他的批判),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的问题分析不仅忽视了阶级斗争的实际,而且他们在帮助掩盖资本主义对大众的驯服和压迫。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的很多工作放弃了对革命的社会变革希望,其作品做作矫情并充满了难懂的行话。在许多方面,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恰恰是为他们所质疑的中产阶级结构的再生产服务。

麦克拉伦努力使人们转而关注阶级斗争的现实及今天这个不平等世界中的种族、性别和性偏好(sexual preference)等方面的剥削。麦克拉伦呼吁用“革命的教育学”重新开始和重振批判教育学的活力。他把这种教育学看作是有助于建立一个资源以更为公平、平等的方式再分配的社会主义世界的教育学。

为此,麦克拉伦在该书中提出了许多反全球资本主义的斗争策略,包括意识形态批判。在他看来,这是教师可以采取的策略。麦克拉伦的反资本主义计划呼吁教师在与社会压迫作斗争的过程中成为道德和伦理的主体,并且要培养、孕育“激进的希望”(“radical hope”)和“乌托邦式的斗志”(“utopian militancy”),这种斗志在某种程度上达到顶点时会导致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统一。

不过,正如批评者所言,麦克拉伦似乎过于乐观,其思想在实践上的可能性是大大值得怀疑的,如,公立学校的老师接受麦克拉伦的号召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切·格瓦拉的教育学能帮他们发展民主学校和进步教育的实践吗?切·格瓦拉的教育学能向教师提供一些用于他们课堂的实质性策略吗?人们是否应该与资本主义进行全面的武装斗争?切·格瓦拉的教育学宗旨又是什么?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西方的左派教育学界。

尽管麦克拉伦早就说了,关于格瓦拉和弗莱雷的叙述特别针对的是在教师教育机构里工作的人,但他的一般性观点很少与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里的教师教育者的日常实际联系起来。就如有人评论说,很显然,这更像一本哲学著作,而不是一本告诉课堂实践者“如何做”的书。实际上也就是说,他的理论没有实践价值。

因此,针对这一问题,有人评论说,假如麦克拉伦想面对教师教育者(teacher educator)表达他的观点并使他们认真对待他的观点,那他就不得不谈谈他的观点究竟对那些每天都在为国家担负着教育重任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对那些攻击教师教育者工作的人(指右派对教育工作者的攻击——笔者注)意味着什么。因为这些教师教育者经常遭遇“政治正确”的困扰,以及遭受那些想通过强制问责(即美国中小学通过标准化考试结果来评价学校绩效——笔者注)来引导和控制教育实践的人的攻击。

麦克拉伦曾乐观地认为,只要教师教育者意识到世界的真实状况以及学校应有的作用的时候,教师教育中的师生们就会乐于从事变革教育乃至社会的事业。在评论者看来,这是个很幼稚的观点,因为他没能将他的许多重要观点与那些他所希望去影响的人们的现实联系起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假如这本书是写给那些已经同意他的政治立场的人看的话,那么这本书也不能提供足够的具体的指导意见去落实他的观点。因此有人讽刺说,对麦克拉伦而言,他的思想观念如何能被他后院的 LA Unified 学区所使用也成问题。由于这本书没能与教师和教师教育者的现实联系起来,该书也就没能为教师教育者提供具体的指导策略和事例,以实现麦克拉伦为人们设定的有价值的目标,因此,一些评论者对此书表示失望^①。

从这本书及此后的一系列著作来看,麦克拉伦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某些方面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价值追求是一致的,即对资本主义进行不妥协的批判,并试图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以实现人的解放和社会正义。马克思主义的叙事如“革命”“共产主义”等字眼也不断出现在他的著作中。但其教育学思想何以无法产生实际的影响?这里所称的“实际影响”,指的是激发人们尤其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反抗意识、产生批判资本主义的实际行动甚至革命的行动。虽然在批判教育学者们看来,意识的问题是个“漫长的革命”,只要社会条件满足就会产生革命的行动。但从根本上看,这恐怕与麦克拉伦的立场属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畴有关。简单地说,他虽然自称是经

^①Kenneth Zeichner. “Review of Peter McLaren, Che Guevara, Paulo Freire, and Pedagogy of Revolutio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hange*, 2001(2): 185-188.

典马克思主义者^①,但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新马克思主义者^②。

新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一种激进的政治思潮,对资本主义采取不妥协的批判态度,拒绝并批判资本主义现行制度及文化。新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弊端,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和路径^③。可以说,它已经成为西方左翼的一支重要力量。

但是,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上的大杂烩。有人将新马克思主义比喻为一种马赛克,意思是它由各种互不相同、常常是相互冲突的理论镶嵌而成,体现了不同流派和内容的多样性。以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为例。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是以后现代主义为主而搭建的多重融合的理论,特别是现象学、后分析哲学、后结构主义等对它的影响至深^④。依据不同的理论传统和倾向,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各自的解释和发挥,产生了纷繁复杂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如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派马克思主义、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管理学派马克思主义、市场马克思主义、女权运动马克思主义等,它们彼此之间以及各派内部之间经常进行激烈争论。

同样,自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麦克拉伦,其批判教育学思想来源也一样复杂。关于这一点,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马丁(Gregory Martin)博士说得相当透彻。他说,从根本上而言,就马克思主义来说,麦克拉伦的理论实际上是折衷的和非宗派的。因为麦克拉伦曾表示钦佩不同的人物,像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古巴游击队领袖切·格瓦拉、无政府主义者艾玛·金伯格(Emma Goldberg)、民族主义革命家埃米利奥·萨巴塔(Emilio Zapata),以及和平主义革命家印度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和美国

的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等。他的批判教育学与杜威的著作、拉丁美洲的大众教育学和解放神学传统以及启蒙运动的批判传统也有关联。在他最新的作品中,他很赞同马克思主义的反先锋主义(Anti-vanguardist)传统,例如对拉娅·杜纳耶夫斯卡娅和彼得·胡迪斯(Peter Hudis)的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Hegelian Marxism)、自由意志论的马克思主义(Libertarian Marxism)或者是此后哈雷·克里福尔(Harry Cleaver)的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以及反威权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政治学的某些理论都有所涉及。所以,在他的著作中,议会共产主义(Council Communist)、工人议会马克思主义(Workers' Council Marxist)色彩比较浓郁。开放的马克思主义者(Open Marxist)如约翰·哈罗威(John Holloway)和维纳·邦费德(Werner Bonefeld)对他也有影响。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反等级制、分权化、基层组织等出现了新的形式,麦克拉伦为这些新的形式也提供了批判性的支持^⑤。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产业和市场造成的“全球化”特征,一些学者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跨学科研究^⑥。以麦克拉伦为代表的一批教育学者适时追踪了这一动向。进入21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危机日益加深,新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力度有所加大,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有所加强,但是,仍然脱离不了这种理论的共性,即不是基于社会总体实践而提出革命的解放理论,而是远离工人运动,主张非暴力革命,成为事实上的“学院式马克思主义”。他们所谓的“回归马克思”实际上只是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方式而不是实质。虽然麦克拉伦要比其他批判教育学者更接近经典马克思主义,但他的理论从总体上看仍属于新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虽然高唱“回归马克思

①彼得·麦克拉伦,于伟:《学者对于正义的追寻——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访谈录》,《外国教育研究》2015年第6期。

②这里的“新马克思主义”,特指与19世纪经典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制度社会主义所实行的主流状态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另类”马克思主义,包括卢卡奇以来西方出现的一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另类解释的思潮和学派。这里的所指与周德明的观点一致。具体参见周德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世纪主题》,《科学社会主义》2004年第3期。虽然有的国内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概念辨析(参见:李忠尚:《“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的异同》,《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6期),但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我国学者基本上混合使用这两个概念。本文也不作严格区分。

③王玫:《新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左翼的一支重要力量》,《红旗文稿》2005年第17期。

④蔡正丽,李明:《多重融合: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场域探析》,《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⑤Gregory Martin. "Remaking Critical Pedagogy: Peter McLaren's Contribution to a Collective 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gressive Education*, 2006(3):65.

⑥静远:《当代“新马克思主义”思潮述评》,《燧石》1998年第3期。

思”,但总体而言,是在“修正”马克思主义。

这不仅仅指麦克拉伦,还可以法国马克思主义为例。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通过多种形态各异的解读方式,对马克思的辩证法、实践观、权力话语、生产范式和人的自由与解放进行全面解构和重新诠释,并接入各种现代思潮,以此来完成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和批判,他们的叙事话语更侧重于对马克思的重构,立足于“自己讲”^①。从麦克拉伦的思想来源及其关注的主题和叙事方式看,他本质上也是立足于“自己讲”。

这在另一些提倡“回归马克思”的批判教育学者身上表现得也很突出。马洛特(Malott, C)与福德(Ford, D.R.)主编的《马克思、资本与教育:走向一个形成中的批判教育学》(*Marx, Capital, and Education: Towards a critical pedagogy of becoming*, 2015)一书是研究批判教育学“回归马克思”不可忽视的重要著作,该书被誉为“激进教育者的基本读本”,作者在“呼唤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革命教育学的形成”。但该书在理论上则综合了黑格尔、马克思乃至后现代主义者的一些观念,因此也是立足于“自己讲”。

所以,从整体上或根本上而言,批判教育学不可能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它避谈

或轻谈阶级及阶级斗争,更不用说用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虽然,批判教育学也谈实践,很显然,这种实践观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革命的实践观。由于西方左派的整体没落,“回归马克思”还只是左翼学术圈的一种动向,再加上体制内的学术与社会运动之间的脱节,很难形成从根本上颠覆现有制度的力量。一种教育理论要发生革命性的影响,社会条件的成熟更为关键,这点麦克拉伦是很清楚的。他也会针对有些人不切实际的想法说:“有人认为美国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复兴。这无疑是一个过火的断言。”^②

总体看,西方批判教育学缺乏真正的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只能称为“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尽管这种修正对资本主义病理的解释及批判有一定的深度,且能引起社会的部分共鸣,但也仅此而已。另外,由于批判教育学日益脱离工人运动的实际(不否认少数人比较注重参加社会运动),而蜕变为一种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实际上也无助于教育的真正变革。当初人们对麦克拉伦学术转向曾抱有很高的预期,实际上美国乃至西方的现实让人们看到,批判教育学“回归马克思”的路还很漫长——甚至因其自身缺陷,这种“回归”的社会反响并不如意。

“Return to Marx”: Current Critical Choi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 Its Problems and a Case Study of McLaren's Exploration

ZHOU Xianfeng & WANG Xi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Some western critical education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McLaren, put forward that critical pedagogy should “return to Marx” and make unremitting effor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crisis deepening and the left revitalization. As a new development trend of critical pedagogy, “return to Marx” borrows Marx's original narrative mode to revise the Marxist critical tradition in form. However, because of its non-classical Marxist position and revision rather than revolutionizatio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it is impossible to become a real Marxist pedagogy. Therefore, the significance of critical pedagogy in criticizing capitalism is limited.

Key words: pedagogy; left revitalization; “return to Marx”; classic Marxism; neo-Marxism

(责任校对 朱春花)

^①陈良斌,盛凌振,许苏明:《“回归”马克思的原初叙事——论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解读马克思社会批判的基本话语主题》,《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②彼得·麦克拉伦,王雁,苏启敏:《批判教育学面临的挑战及其可能的未来》,《教育研究》2020年第4期。